

书评大桥史惠著《现代中国家政劳动者的移居：农村城市关系与再生产劳动中的性别政治学》

定松文

(惠泉女学园大学教授)

- ◎ 原文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中国研究所,第66卷第1号,2012年1月,46~48页。
- ◎ 欧文东译
- ◎ 原书为『現代中国の移住家事労働者—農村-都市関係と再生産労働のジェンダー・ポリティクス』お茶の水書房,2011年。

此书是通过对当事人进行定性调查,并站在国际迁移研究框架及性别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分析了中国农村出身女性移居大城市北京、从事家政劳动以及“通过经验构成主体”的社会状况。

如终章结论所示,此书以北京市的家政服务为题材,分析了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间,农村出身女性在城市承担再生产劳动的结构重组过程。首先,站在宏观的角度,使用“蓄水池”这一在国际移民研究中表示劳动力供给源的类比,探索了自户籍制度建立以来,农村女性在再生产领域迁移及城市女性往生产劳动领域迁移这一政治力学“回路”的变迁轨迹。其次,站在居中的角度,分析了对城市再生产劳动而言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和面向生产劳动的城市女性劳动力这两个“蓄水池”的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政府组织(NGO)等利害攸关者。最后,站在微观的角度,把农村女性通过劳动移居改变现有性别关系等的主体实践理解为“水路”。以上,通过将宏观、居中、微观三者实现相互关联的分析手法,指出:今日中国可见的农村城市二元关系带有强烈的性别政治学色彩。

上述观点因书作者的资料调查、访谈调查及基于多角度分析而被立体地呈现出来。具体而言,2004年8月至2007年6月,书作者参与考察了面向农村出身女性劳动者的NGO“打工妹之家”,采访调查了6家北京市家政服务中介经营负责人、12位农村出身的家政劳动者或有过家政服务经历的劳动者。下面的内容略显冗长,但为了梳理书作者的思考过程与逻辑结构,拟按篇章顺序进行概括。

全书分序章、正文6大章及终章。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期间的农村城市关系,指出:城市的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分工是因农村及女性这两个“蓄水池”而得以实现的。农村女性从事生产劳动同时承担再生产劳动,1990年后形成了农村出身女性奔赴沿海工业部门就业的“蓄水池”。据悉,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无关,女性的再生产劳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产生上下波动。

第二章的统计资料证实，中国城市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整合秩序由工作单位向社区转移，把家政、育儿、护理等再生产功能保留在家庭内部的社会压力以及在现实中家庭成员又无力承担的窘境，是家政劳动者存在的前提。

第三章的分析指出：全国妇联抓住始于1980年“妇女回家”争论所出现的社会分工重组动向，在对经济合理化与女性运动近似过激反应的现象之中，积极推动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促使城市女性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分工。

第四章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进行概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的城市劳动政策与全国妇联强调农村妇女权利、推行农村女性“双学双比”（学基础素养、学科学、比发展、比贡献）计划有关，与国务院扶贫计划等举措有关。一系列的农村开发扶助政策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利害得失的关心。城市妇联反对回归家庭，这与参加促进农村出身者投身再生产劳动的事业有关，与农村出身者的监督与管理有关。

延续至今的政策及经济所引起的社会变动造就了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家政劳动者。基于这一结构性分析，第五章从6名家政劳动者的生活经历入手，细致地描述了城市女性为从事生产劳动而出去工作，农村出身女性作为再生产的劳动力被迁移，而且其迁移还显现出多样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感受到，农村女性劳动者在经历集体招聘之后，会选择摆脱“正规”的找工渠道，如根据自己的判断更换中介公司进行注册登记，与雇主进行私下交涉，转行做家政劳动以外的工作等等。第五章还提出，尽管住家家政劳动者面临“无依无靠”、缺少信息源这样的残酷环境，可是她们却作为主体的行为人站了起来。这源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所养成的自律及在人际交往中所获得的知识。

第六章分析指出，NGO“打工妹之家”为农村出身的家政劳动者自行交涉、寻找工作场所和签订合同，发挥了作为知识和动力提供者的功能和意义。此NGO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女性知识分子通过与国内外政治人物及媒体网络的关联，在尝试“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该组织的知识分子将农村女性作为“牺牲者”予以旁观，否定了移居劳动者的行为主体性。在此，同样是中国女性，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环境及认识的差异就浮现出来。因此，书作者把农村女性理解为维持当前生计的行为主体，她们身处移居劳动的“回路”之中，既没有“牺牲者”的完全被动，也没有积极参与“回路”的能动性。书作者将她们的个人生活脉络命名为“水路”，以尝试把握她们的迁移与主体性。

在“回路”的重组过程中，农村女性被要求作为主体，掌握能动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接轨的素质。关于如何置身“回路”的问题，女性们制订了各种各样的策略，被动客体和能动主体这两个意象都将农村出身的家政劳动者置于两个“蓄水池”的结构之中，书作者在进行分析时没有把考察对象纳入到“城市-农村”的二分法范畴之中。换言之，由“农村女性在多重权利关系结构中一直无从诉说自己所关心的利害得失”的言谈中，不做出是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的定论，而是指出她们是活在“水路”之中“被赋予状况的主体”，并将重点放在欲从下一代女性身上找到未来的农村出身女性之生活方式上。

本人将举出此书的两大优点进行评述。

首先，第一点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手法，以实证手段验证性别政治学的问题。现代是一个界限模糊、极具流动性的时代。要把握在此时代生存的人和社会状况，就有必要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知识，多层次、多角度地去解剖社会现象。正因为是从各种不同角度而不是拘泥于一个学科进行探讨，才让我们有可能接近挖掘的对象。学术世界注重专业性，但专业范围有时会把研究对象矮化，甚至会把研究对象禁锢到已有的分析框架之中。如果半途而废，跨学科的研究手法就会以肤浅的记述而告终，但此书却是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并不断向研究对象挖掘的范例。

第二点是运用“水路”这一类比，清晰地说明了主体的行为选择依存于主体的生存现实和状况之中。所提出的新概念和所阐述的逻辑，均是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细致分析和对问题的精心调研。此著作耗时漫长，对近来只注重论文数量及短期成果的评价倾向也是一种警示吧。

国际象棋的世界王者加里=卡斯帕罗夫就“磨练决断力”如是说：“从被教条束缚的思维中解放自己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中略）要将已掌握的知识向前推进，发展成独创性的思考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有必要从已有的知识中稍稍放手，捕捉新的视角和想法。（中略）最好是在完全吸收了已知的事情之后，自信地往后退一步。如果后退，事物的全貌就会呈现出来。从中可以发现新的路径并找到新的联系。新的关联性出现时，旧的信息就会让人觉着新鲜。这时，创新就不是偶而是必然。”之所以绝对不要忘记当事人、不要把听到的言语之意限制在固定的框架之中，或许是因为，书作者刚偏离“无依无靠”“普通的”回路，就遇到了性别论，同时深切地感受到一边研究一边生存下去的无助感。论文要做到新颖和有独创性不容易。但是，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持续对话，为找到新颖和独创性付出努力，其成型的东西就会有价值。

最后，我想指出两点作为今后的课题。第一是基于输出劳务的农村家族的视角。如果用夹杂着这种视角的性别政治学进行分析，对第一章的农村变化分析就可能被进一步细化。目前，国际迁移论也提到劳务输出家庭视角的重要性。为什么不能回家？不仅仅是因为移居女性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开始拥有个人意志，而是因为劳务输出家庭的具体情况。可能是女性不在家期间，家庭关系及经济情况等也发生了变化。据说，在对出国打工劳动者的研究事例中，即便一度返回（劳务）输出地，也会有再度去海外打工的倾向。我希望作者就劳务输出地与家庭关系进行深入挖掘。

第二是通过访谈调查等所研究的再生产劳动以及关于再生产劳动的夫妇间性别政治学视角。此书揭示了城市和农村女性劳动因“男性”生产劳动及所得变化而随之变化这一相互关系。夫妇间是如何通过交涉和妥协来分担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如何决定让再生产劳动部分外化并开始依靠家政劳动者的呢？如果能够弄清诸如此类的城市夫妇间性别政治学，其分析就会更加透彻吧。

这是书作者自己也提到过的研究课题，由城市知识女性牵头的“中国女权主义”之多层

次性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评论者的我完全是不同地域的人，但在海外也一直从事调查研究。凭自己的经验知道，被访谈者的回答会因语言不同、听者的经验、属性以及访谈人提问的情形不同而有变化。如有些事情当时打听不到，有些事情因政治原因等不敢讲。因此，海外调查是困难的，我希望此著作不要设结尾，而是继续对相同的人进行跟踪调查。

总之，我希望今后能站在书作者所援引的斯科特话语视角——“必须通过主体言说置身于被定位的历史过程——经验由此而产生。并不是个人拥有经验，而是通过经验构成主体。”——开展更深入的研究。